

《守望莱茵河》是美国女剧作家丽琳·海尔曼(1905—1984)的代表作,根据好莱坞舞台改编的电影曾获1944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。剧本有多个中译本,最有名的是冯亦代译本。

冯译《守望莱茵河》1945年重庆美学出版社初版,1947年上海新群出版社再版。再版本的译者《沪版后记》中,在介绍了作者和她的文学成就后,对翻译这部反法西斯名剧的过程也交代甚详:

翻译这剧本是在1944年的夏天。当时在重庆是极难读到外国书籍杂志的,戏剧书更是难得。不过那一年恰好华莱士先生带来了几本送给郭沫若先生,而辉叔却又在郭先生处看到这本书。《守望莱茵河》使他废寝忘食地读了三整天。他极愿望能把它译出来,不巧,他自己手头正在写剧本,等着要上演,便把这工作交给了我。

来到过重庆的人永不能想象到重庆的暑天是个什么样子。我在发烫的办公桌上,汗流得使桌面像水洗过一样,利用了每天在传单上盖图章的空隙中,以半个月的时间把它译完。其后又得到辉叔的帮助,把全剧的对白与原书对照润饰了一次。读这剧本而不感到那种常见的译文生硬与佶屈聱牙,实在应该感谢他的细心修改。

毛边举隅

《守望莱茵河》再版本

陈子善



《守望莱茵河》书影

这两段话有必要作些注释。1944年6月,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,他把“现代文库”版《丽琳·海尔曼戏剧集》送给了郭沫若。“辉叔”在郭处见到这本戏剧集,对书中所收的《守望莱茵河》产生浓厚兴趣,“废寝忘食地读了三整天”。但因他正在赶写剧本,故改请冯亦代翻译。冯冒着酷暑译出后,“辉叔”又对全书对白作了“润饰”。可见“辉叔”对冯译《守

望莱茵河》起到了关键作用。那么,“辉叔”到底是谁呢?36年后,冯亦代自己揭开了谜底:

夏衍同志(就是我在解放前为《守望莱茵河》所写《译后记》中的辉叔)看了这本集子里的《守望莱茵河》,认为这个剧本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个好戏,应该翻译出来。他工作忙抽不出时间,就把工作交给我做了。(冯亦代《〈小狐狸〉译后记》,《外国戏剧》1980年

第二期) 不仅如此,冯亦代在《沪版后记》中对再版本出版经过也作了详细说明:

本书渝版由美学出版社于1945年印行,编入“海滨小集”,封面为廖冰兄所作,印三千册已售完。这次是以纸型重印的,封面因原版已毁,故请丁聪兄重作。书中旧有译误如“叔父”应为“舅舅”,及误排“妹妹”应为“姊姊”等

均已改正。这致致谢葆荃兄及枚屋兄的指正。

原来这部中译初版和再版的封面设计不一样,这两个封面设计都有名。丁聪设计的再版本封面曾被姜德明收入《书衣百影》,赞之曰“增加了喜剧效果,含有电影招贴的意味”。这个封面设计与另一个《围城》初版本封面堪称丁聪装帧艺术的“双璧”。而对初版本译文正误的葆荃是著名翻译家戈宝权;枚屋则是“张派”小说家李君维。李后来对此有过回忆,冯亦代不以他在报上撰文批评为忤,相反还约他见面,延聘他进冯主持的《世界晨报》工作,还接替离职的袁水拍主编副刊。(参见李君维《冯亦代二三事》)

我收藏的《守望莱茵河》再版本为毛边签名本,毛边在书口和书顶,符合鲁迅对毛边本的要求。1940年代后期,新文学毛边本已很少出现,《守望莱茵河》再版本毛边本是难得的。签名为钢笔,签在扉页右下方:

仁伟兄留念
亦代
卅六,七,廿八后
但仁伟为何人?待考。

《守望莱茵河》的翻译和出版,涉及郭沫若、夏衍、冯亦代、廖冰兄、丁聪、戈宝权、李君维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么多作家和艺术家,缺一不可,堪称一段文坛佳话。

读《中华读书报》(2019年10月16日)“国学版”徐晋如先生的《怎样写古诗词:词别是一家》(下简称“徐文”)。一篇关于词学、词史、词艺的好文章。特别是在关于词的地位和词艺方面,作者的观点很是精到:一、能写诗的未必能写词;二、词比诗更美;三、词并非历史上有人所说是“诗余”,而是一种独立于诗的文学形式。不过,该文提及的词的历史,则有二三话题与作者商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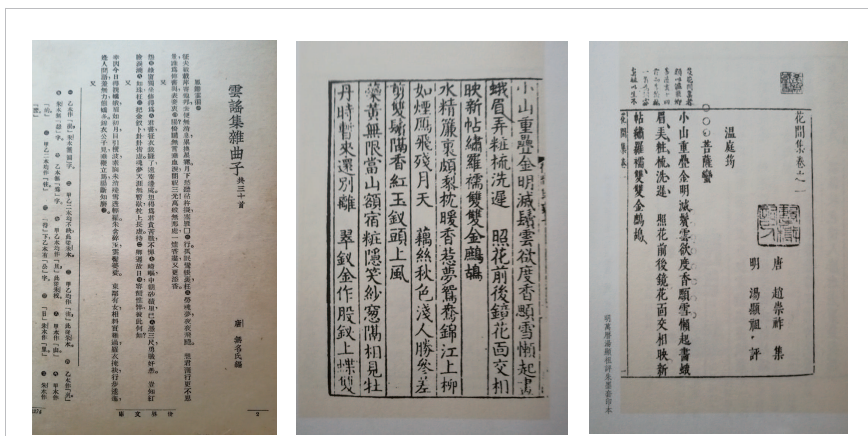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是关于《花草粹编》和《云谣集杂曲子》。《花草粹编》和《云谣集杂曲子》是词史上的两个重要集子,但“徐文”没有提及。

《花草粹编》为明人陈耀文(1526—1670)所编。陈,嘉靖万历人,《明史》虽无专传,但多有提及。陈依据五代编集的《花间集》和明初编印的《草堂诗余》为底本,编集为《花草粹编》,其中,“花”代唐五代词,“草”代宋词。共录有唐、五代、宋(及少量的元词)3280余首。《花草粹编》,为词的历史最重要的一部词选集。再就是,《花草粹编》,编辑体系有别于其他词选。《花草粹编》,一不以词人为条,二不以时间为条,而是一部以词牌为条的词选集。即以“小令”“中调”“长调”为经,词牌、词为纬编纂的。这种以词牌为条的词选,有助于写词者,特别是初写者参阅(自然,它的缺点是把词人及他的词给支离了)。所录3280余首词,在当时也属海量。说词史不应绕开去。

《云谣集杂曲子》,为晚清从敦煌石窟发现,集唐(或有五代)词30首。晚清民国初年,中国在古籍新材料的发现,有两个重大事件,一是甲骨文的发现,开启了研究中国上古文字和历史的新领域和新途径。一是敦煌抄本的发现,开启了研究中古佛学、历史、文学、绘画等多个的新领域和新途径。作为敦煌抄本的《云谣集杂曲子》流失海外,后从英国伦敦博物馆抄回中国。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罗振玉、王国维、

关于词史的二三话题

刘 火



相关书影

朱祖谋极为看重,除了考订它们的真伪外,刊印时,罗、王、朱都为此作序。民初印制的《世界文库第六册》,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列为目录之二印行。录有罗、王、朱的序和近现代中国古典文学史大家郑振铎的序。“郑序”说,“唐五代词存于今者,于《花间》《尊前》《二主词》(案,南唐二主)《阳春集》外,寥寥可数。今此本复现人间,可称研究唐五代词者的大幸”,可见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发现的重要。可惜“徐文”未提及这集子。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,那么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就是一部最早成集却最后才见天的词的集子。这部最早的唐(或有五代的)词集,在郑振铎看来在词学研究上应具有转折意义。如“徐文”所讲“历史上有一群人,不大瞧得起词,认为只是文人在宴会上的即兴游戏,又或者只是言情的小道”。《云谣集杂曲子》重归人间,郑振铎说,词并非靡靡之音,而且“苏辛派的词,我们想

不到在唐五代的时候是已经有人写作了”。郑序由此进一步指出:“这个发现,是可以使论词的人打破了不少的传统的迷障的。”近现代治词大家龙榆生“词学四种”之一的《唐五代词选注》,选有《云谣集杂曲子》(案,龙选时未注明来自《云谣集杂曲子》)“风归云”两首、“洞仙歌”一首、“破阵子”一首等,其中“风云归”的“征夫数载,萍寄他邦。去便无消息,累换星霜。月下愁听砧杵起,塞雁南行。孤眠鸾帐里,枉劳魂梦,夜夜飞扬”就是郑振铎所说的苏辛派的词,“在唐五代的时候就有人写作了”。说词史,不论《云谣集杂曲子》,显然有漏。

其次关于《花间集》。一、“徐文”所说“词的最初的‘格’是由花间集词人所确定的”。事实上是,《云谣集杂曲子》里共有词牌十三个,分别为“风归云”“破阵子”“内家娇”“喜秋天”“天仙子”“浣沙溪”“拜新

月”“竹枝子”“柳青娘”“抛球乐”“洞仙歌”“倾杯乐”和“渔歌子”。“花间”诸人,温庭筠、皇甫松、韦庄三人都属晚唐人(案,韦庄晚唐前蜀人),加上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十三词牌三十首词来看,词在中唐最迟在晚唐就已经兴起和初步定格。二、“徐文”说《花间集》是“北宋词人摹写的范本”。此论缺乏证据。相反的是,中国最早之一的“诗话”,北宋欧阳修(1007—1072)的《六一诗话》只论诗没有论及词。在论本朝蜀人苏东坡(案,苏诗、苏文多过于苏词许多倍)时,也只论及诗未及词,更不要说《花间集》了。李清照《词论》指出“乐府声诗并著,最盛于唐”,李清照说到五代时仅举唐后主李璟的“小楼吹彻玉笙寒”和冯延巳的“吹皱一池春水”两句,根本没提及《花间集》。倒是有疑似指责“花间”诸人的词为“郑卫之声日炽”。从《花间集》的印制史来看,也能证明《花间集》并非“北宋词人摹写的范本”。今存《花间集》的最早印本为南宋绍兴十八年即1148年。从词学的典籍看,宋人关注《花间集》大约是从南宋开始的。如黄昇的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在提及到温庭筠时说,温“宜为《花间集》之冠”。如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说《花间集》有卷存世十卷,又如张炎的《词源》说《花间集》诸词韦庄、温飞卿为则等。第一次全面评点《花间集》要等到明万历年间的汤显祖了。联想到明人的多部词选,特别是陈耀文编的《花草粹编》,明代重拾对《花间集》的喜好,大约与明中晚期的奢靡社会风气有关。同时与明代戏剧兴起和兴隆有关。因为明的戏剧里的大量唱词,其主要资源不是来自诗,而是来自宋词与元曲。所以我们就并不难理解,《花间集》的评点要等到它问世后近六个世纪才有人来做。三、“徐文”说《花间集》“全是小令”,这话也不尽然。《花间集》录欧阳炯的“贺明朝”即“忆昔花间初识面”词,在陈耀文编的《花草粹编》里,就被放在了“中调”。